

重庆成为行政院甲种市

行政院改重庆为直辖市的训令

行政院转发国民政府定重庆为陪都的训令

重庆于1929年2月正式建市，早在建市之前的1928年8月，当国民政府公布《市组织法》，规定市分普通市和特别市之后，初掌重庆市政的潘文华，就以重庆为“西南重镇，商务繁盛，人口日增”为由，准备将重庆市的市政组织按特别市的规模设置，并曾派士绅代表赴南京向国民政府请愿。只因未获国民政府同意，又感到申报呈核手续过于麻烦，才按普通市组织，于1929年2月正式建市。这以后，重庆又曾多次要求改重庆为行政院直属之特别市，但均因种种原因，未获批准。

抗日战争爆发后，国民政府迁都重庆，重庆政治地位随之提高，市区人口也大幅增加。战争带来的重庆的特殊地位，要求与之相应的政府组织。为此，第一届国民参政会参政员胡景伊等21人于1938年建议国民政府改重庆市为甲种市，直隶行政院。该提案经国民参政会决议陈准国防最高会议交行政院审议。1938年10月，行政院第384次会议讨论通过了行政院长孔祥熙提出的改重庆为行政院直属市的提案，决议“准援照直属市组织，定名为重庆市政府，仍隶属于四川省政府。但为增进行政效率起见，必要时得逕函行政院秘书处转呈核示。”1939年4月，行政院向国防最高委员会提议称：“查重庆市向为西南重要商埠，现已蔚成政治文化中心，该市政府虽系援照直属市组织，因事务日繁，其行政系统及政权，亟须明确规定，以资运用。兹为促进行政效率，适应实际需要，拟即将该市改为直隶于行政院之市。”该提议得到了国防最高委员会的批准，从而完成了改重庆为行政院直属市的法律程序，所余的只是伺机公布了。

1939年初夏，日机对重庆实施疯狂的“五三、五四”大轰炸，造成重庆市民死伤6 000余人，财产损失无数，整个城区大半被毁的惨状。面对此等空前灾难，重庆人民并未屈服，而是表现出了不畏强暴，坚决抗战的决心、信心和勇气。国民政府也于1939年5月5日采取断然措施，发布了改重庆为行政院直属之甲种市的明令，以此回答敌人的野蛮轰炸，回报重庆市民的巨大牺牲，表明政府当局的抗战决心。1940年9月6日，国民政府又发布训令，“明定重庆为陪都”。作为战时首都，重庆已成为中国大后方的政治中心。

与此同时，国民政府还改组重庆市政府，同时扩大重庆市区，将原巴县、江北两县政府迁出市区办公，市属基层组织也由原来的6区增加到12区。重庆陪都建立后，市区范围得到进一步拓展，从原巴县划入了五个区，再加上一个水上区，使重庆市的基层组织扩大到18个区，水陆面积也增加到328平方公里，进一步巩固了重庆旧城区、江北、南岸三足鼎立的地位，奠定了今天重庆市区的雏形。抗战前夕，重庆城市建成区面积约12平方公里，城市人口约30余万。抗战爆发后，重庆城市迅速膨胀，原有的城区已远远不能适应需要。为安置内迁单位和人口，重庆旧城区、新市区的空地和化龙桥、土湾、小龙坎、沙坪坝、海棠溪、龙门浩、玄坛庙、弹子石及江北老城、溉澜溪、陈家馆、香国寺、猫儿石一带，各种简易房屋和厂房、工棚拔地而起，郊区已扩展至磁器口、歌乐山一带。到1938年底，城市建成区面积扩大到近30平方公里，人口达50余万。为避免日机轰炸，1939年2月上旬，重庆市政府奉国民政府令，动员全市机关、学校、商店限期疏散。3月底，国民党中央、国民政府各机关组成迁建委员会，决定各机关迁散至重庆附近100公里范围内。同时决定将成渝、川黔公路两侧，重庆周围80公里范围划归重庆，其行政权仍由当地政府掌握。这以后，各党政机关相继迁至郊区和迁建区办公，另在市区设办事处对外联系；部分厂矿企业也迁建厂区于重庆市郊。随着迁建区的形成，1940年，城市辖区面积增加到约300平方公里，1941年，城市人口突破70万；1945年初，更突破100万。

(吴艾生)